

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的身份认同

徐晓旭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2)

摘要:在希腊化时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已接纳非王室血统的马其顿人参赛。马其顿王国和希腊本土的一些希腊人在外交场合强调彼此属同一种族,说同一种语言,用此话语来谋求团结,应对正在西方兴起的罗马帝国主义的威胁。东方各民族仍延续以往传统,将马其顿人归入希腊人的范畴之内。马其顿人就由原来经常被希腊人认为且自认为与希腊人不同的一个族群变成了希腊人内部的一个次族群。这种族群身份得到了马其顿人自身、希腊人和外族人的一致认可。不过,马其顿认同并没有完全被希腊认同所遮蔽。在相关史料较多的托勒密埃及可以看到,马其顿人能够拥有国王的“同族人”身份,这是一种被置于希腊集体身份当中的更值得自豪的特殊荣誉身份。本土的埃及人也不缺少获得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身份的社会机会。在希腊化世界里,马其顿人身份认同依然处于动态建构之中。

关键词: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希腊人;族群;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K54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8)03-0105-08

马其顿人属于希腊人吗?古代文献^①中大体有三类说法:一类将他们归入希腊人或暗示他们与希腊人有关联[1](frs.9,10(a)20-24,7)[2](fr.74)[3](1.56.3,8.43.1)[4](3.96-97)[5](10.48)[6](7.7.1,7a.1.9);一类明确或间接地否认他们是希腊人[7](fr.2)[8](3.24;9.30-31;19.305,308)[9](2.41-43,47-48)[10](17.110.1-106.6)[11](618);还有一类宣称其王室是希腊人而普通马其顿人并非[3](5.22.2,8.137-139,9.45,7.130-132)[12](2.99.3,5.80.2,2.80.5-6,4.124.1,4.126.3)[13](fr.393)[14](7.1)[15](5.32-36,76-77,107-108,112-114,127,139,154)[8](19.308)[9](2.41-43,47-48;3.128)[16](50.4-5)。现代人们关于马其顿族群属性的长期争论正是围绕着古代这些相互矛盾的意见展开的,同时来自语言、考古以及关于其文化特征的文献记载等方面的证据也经常被用于讨论当中。传统

的研究在历史上通常采用的是历史实证主义路径,在人类学上则是本质主义路径。历史实证主义将古代文献中保存的神话传说视为对一定客观历史真实的记忆和反映,对史料文本的解释通常建立在对其字面意义直接采信的基础之上,对关于同一对象的不同讲述也加以积极的调和,目的是提供一套看起来合理的历史复原。本质主义则将民族或族群当作一个即便有发展演变但其本质不变的实体,认为只要凭借一系列特定的客观文化特征就可以识别族属或族群身份。两条路径虽来自不同学科,但在旨趣上天然相通,从一开始便自觉结合,其指引下的马其顿族属研究经常是以古代的不同说法为向导,对马其顿人是不是希腊人的问题给出截然相反或颇不相同的答案:或肯定,或否定,或认为国王与臣民不同族^②。此外,民族主义、亲希腊

收稿日期:2017-05-26

作者简介:徐晓旭(1971-),男,河北丰宁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本文引证的古希腊语传统文献均引自权威数据库 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 的古希腊语原文,拉丁语传统文献引自丛书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或在线丛书 The Latin Library (<http://www.thelatinlibrary.com>) 的拉丁语原文,所引部分均依专业习惯按照国际统一的卷、章、节、段、行以及残篇(用 fr. 和 frs. 表示,后者系复数,表示两则及其以上的残篇)等文本位置标号标出。读者能够在其他任何版本的相同古希腊语文献或其任何现代语言译本中按这些国际统一标号非常容易地查找核对相应引用部分(因为尽管它在不同的现代印刷版本中所处页码不同,其标号总是相同的)。

②例如 Απ. Β. Δασκαλάκη, *Ὁ Ελληνισμός της Αρχαίας Μακεδονίας*, Αθήναι, 1960;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 Vol. 1, Oxford, 1972, p. 433; 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Macedonia*, Vol. 2, Oxford, 1979, pp. 42-48; M. B. Sakellariou, "The Zenith of the Archaic Period", in G. Phylactopoulos ed., *History of Hellenic World: The Archaic Period*, Athens/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250-252; M. B. Sakellariou ed., *Macedonia: 4000 Years of Greek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Athens: Ekdotike Athenon S. A., 1974, pp. 44-63; Andrew Rossos, *Macedonia and the Macedonians: A Histor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p. 11-12; Todor Chepreganov ed., *History of the Macedonian People*, Skopje: Institute of National History, 2008; Antonije Škokljčev-Dončo, *Slave Nikolovski - Katin*, and Chris Stefou (Risto Stefov), *Macedonia in Ancient Times*, Skopje: Makedonska Iskra, 2010, pp. 5-142.

主义等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等非学术因素也或深或浅地渗透于争论当中,乃至该问题有时超出学术领域,甚至一度造成希腊和马其顿两国关系的紧张。无论如何,这种传统式样的研究路数在今天仍未绝迹^①。

不过,也有个别学者在本质主义的观察视域之下,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他们倾向于回避讨论马其顿人是否为希腊人,而是把注意力转移到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之间怎样互相看待的问题上^②。这种做法无疑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观察马其顿族性的新视角。然而,关于马其顿人是或不是希腊人的不同意见,并非现代人的发明,而是最终来自古代史料,因此这并不是一个不值得讨论的伪问题。真正为这个问题的研究带来突破的是新的人类学理论的应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古代史学者意识到以往以客观文化特征来识别族群的方法已经走入无休止争论的死胡同,从而跳出了本质主义的窠臼,诉诸一种新的工具主义或情境主义路径来观察和解析族群身份,认识到族群的身份认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中、出于一定的动机、通过话语建构起来的,客观文化特征只构成认同建构中可被操控的标记,并且认同是处在持续被建构的过程当中的。同时,在不断出现的采用这种新的人类学理论讨论古代族群身份认同的研究当中,传统的历史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也遭到较为彻底的批判,史料文本不再被简单地等同于对客观历史真实的自然展现,而更多地被当作生成于一定社会情境的话语建构、策略或修辞。新的研究理路也打破了长期以来马其顿族属问题研究的僵局。一些学者不再执念于做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更不会从移民史的思路来考虑关于马其顿王室的希腊性叙事。在他们的解读之下,马其顿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王室,其族群身份是一种被来自他们自身、希腊人以及相关各非希腊族群等多方面的话语建构的产物,且随

时代和情境的变动而呈现出弹性和可变性^③。

公元前4世纪中期是希腊人当中关于马其顿族群身份争论最为激烈的时代,这与腓力二世领导下的马其顿作为强国兴起、谋求希腊世界霸权的国际形势直接关联。但随后亚历山大的征服造成了一个具有某种“全球性”的希腊化世界。在这种新的更大的族群—文化地理系统当中,依然存在着老问题:马其顿人是谁?他们是希腊人吗?不过,答案经常是与以往不同了,而且在不同的场合下也会有不同的马其顿人现身。这些新情况值得观察和分析。

一、参加奥运会:希腊身份的一种认证

在奥林匹亚举行的祭祀宙斯的宗教节日赛会即奥林匹克运动会只有希腊人才能参加,故而被认为是希腊身份的一个标志。关于这一点最早的史料恰恰来自希罗多德谈论马其顿王室阿尔盖亚戴(Argeadai)家族希腊移民出身时的一段文字:

佩尔狄卡斯(Perdikkas)的这些后代,按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希腊人。我碰巧也知道这一点,并且将在后面的讲述中证明他们是希腊人。此外,那些管理在奥林匹亚的赛会的“希腊裁判”(Hellenodikai)也知道他们是希腊人。因为亚历山大决定参赛并为此来到赛场后,将要与他赛跑的希腊人不许他参赛,说蛮族人不能参赛,赛会只是希腊人的。但当亚历山大证明了他不是阿尔戈斯人后,他被判定为希腊人,并且在一斯塔狄翁赛跑(stadion)中获得了并列第一名[3](5.22)。

文中这位亚历山大即亚历山大一世(约公元前498—454年)。无论他真正参加了奥运会与否,也无论这段“历史”是否为马其顿官方伪造的对希腊世界的宣传说辞,马其顿王室的祖先来自希腊伯罗奔尼撒的阿尔戈斯(Argos)的起源神话甚至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都

① 关于希腊和马其顿共和国在利用古代马其顿历史建构民族认同方面的争执,请参见 Victor Roundometof, *Collective Memory, National Identity, and Ethnic Conflict: Greece, Bulgaria, and the Macedonian Question*, Westport: Praeger Publishers, 2002; Loring M. Danforth, “Ancient Macedonia, 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Star of Sun of Vergian: National Symbols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Greece and 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 in Joseph Roisman and Ian Worthington eds.,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10, pp. 572—598.

② 此类研究有 E. Badian, “Greeks and Macedonians”, in Beryl Barr-Sharrar and Eugene N. Borza eds., *Macedonia and Greece in Late Classical and Early Hellenistic Times*, Washington: Trustees of the National Gallery of Art, 1982, pp. 33—51; E. N. Borza, “Greeks and Macedonians in the Age of Alexander: The Source Traditions”, in R. W. Wallace and E. M. Harris eds., *Transition to Empire: Essays in Greco-Roman History 360—146 B. C.*, in Honor of E. Badian, Norman/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6, pp. 122—139; E. N. Borza, *In the Shadow of Olympus: the Emergence of Maced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90—97.

③ 采用这种方法的研究均为新近之作: Winthrop Lindsay Adams, “Historical Perceptions of Greco-Macedonian Ethnicity in the Hellenistic Age”, *Balkan Studies* 37(1996), pp. 205—222; J. M. Hall, “Contested Ethnicities: Perceptions of Macedonia within Evolving Definition of Greek Identity”, in I. Malkin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59—186; 徐晓旭:《马其顿帝国主义中的希腊认同》,《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第24—34页(该文的现代马其顿语译文:“Хеленскиот идентитет во контекст на македонскиот империјализам”, *Ziva Antika (Antiquité Vivante)* 62(2012), pp. 89—110, Igor Radev 译); Sulochana Ruth Asirvatham, “The Roots of Macedonian Ambiguity in Classical Athenian Literature”, in Timothy Howe and Jeanne Reames eds., *Macedonian Legacies: Studies in Ancient Macedoni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Honor of Eugene N. Borze, Claremont: Regina Books, 2008, pp. 235—255; M. B. Hatzopoulos, “Macedonians and Other Greeks”, in Robin J. Lane Fox ed., *Brill’s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of Macedon, 650 BC—300 AD*, Leiden/Boston: Brill, 2011, pp. 52—78; Johannes Engels, “Macedonians and Greeks”, in Joseph Roisman and Ian Worthington eds.,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pp. 81—98; Sulochana R. Asirvatham, “Perspectives on the Macedonians from Greece, Rome, and Beyond”, in Joseph Roisman and Ian Worthington eds., *A Companion to Ancient Macedonia*, pp. 99—124; Edward M. Anson, *Eumenes of Cardia: A Greek among Macedonians*, Leiden/Boston: Brill, 2015, pp. 213—240.

为相当一部分希腊人所接受。那时候腓力二世在扩张,每一个希腊人不是忧心于马其顿的威胁,就是预感到马其顿国王将要领导希腊世界。像德摩斯梯尼这样的反马其顿派会把腓力骂为“蛮族人”(βάρβαρος) [8] (9.31),这是希腊人对一切非希腊人的统称和蔑称。而伊索克拉底是把马其顿王室的希腊起源神话作为敦促腓力承担起领导希腊人远征波斯的历史重任的理由之一:“阿尔戈斯是你的祖国”,“把整个希腊视为自己的祖国,像你的祖先一样” [15] (5.32, 127)。埃斯奇奈斯则先多次辱骂腓力是“蛮族人”和“作恶者”,后来又夸赞腓力是“人类当中最彻底的希腊人”(Ελληνικώτατον) [8] (19.305, 308) [9] (2.41-43, 47-48)。这种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话语前后转变,也意味着关于腓力身份的两种迥然不同的声音在当时都很大,乃至人们在这个问题上需要选择立场。

不过,尽管雄辩的德摩斯梯尼们在政坛上制造的响动很大,腓力却在奥林匹亚的“希腊裁判”那里顺利通过参赛资格审核,连续参加了三届奥运会且均获胜利,即公元前356年第106届赛马、公元前352年第107届驷马车赛(tethrippon)、公元前108年第124届驷马车赛(synoris)冠军 [17] (P123 no. 434; P124 no. 439; P124 no. 445)。而在腓力二世之前、亚历山大一世之后,还有一位马其顿国王阿尔凯拉斯一世(Archelaos I, 公元前413-399年)也有获奥运会和德尔菲的皮提亚运动会驷马车赛冠军的记录^①。据路易吉·莫雷蒂(Luigi Moretti)考证,他参加的应为公元前408年的第93届奥运会 [17] (P110-111 no. 349)。奥运参赛等于是希腊人的身份认证,三位国王多次参赛的记录,表明马其顿王族对于希腊身份的自我认同和获得希腊国际社会的承认都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

莫雷蒂详实辑录了古代文献的各种记载,经严加考证编订而成的《奥林匹克奥尼凯——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者》(Olympionikai. I vincitori negli antichi agoni olimpici)是迄今学界公认的关于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者最权威的史料集。从这部史料集中可以看到,到亚历山大三世即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逝世前5年,首次出现了一个非王室出身的马其顿人荣获奥运冠军的“新闻”:克利同(Kliton或Kriton)获公元前328年第113届奥运会一斯塔狄翁赛跑胜利 [17] (P127 no. 463)。这之后,又陆续传来非王族的马其顿人在奥运会上的佳绩。公元前304年兰波斯(Lampos)在第119届奥运会上取得驷马车赛的胜利,其故乡是当年腓力

二世建立的城市腓力波伊(Philippi) [17] (P132 no. 498)。在公元前3世纪另有3名非王室来源的马其顿人5次奥运夺冠的记录。一位名叫安提果诺斯(Antigonos)的马其顿人于公元前292年和公元前288年摘取第122届和第123届奥运会一斯塔狄翁赛跑的两连冠 [17] (P134 no. 527, P135 no. 533)。公元前268年第128届奥运会对我们感兴趣于马其顿人奥运成绩的人来说,无疑更具有轰动性:它产生了两位冠军:一斯塔狄翁赛跑的冠军由塞琉括斯(Seleukos)摘取 [17] (P136 no. 543);另一位冠军则是马其顿妇女蓓丽丝提凯(Belistikhe),她不仅取得本届驷马车赛胜利,而且紧接着又荣膺下一届即公元前264年的第129届奥运会驷马车赛的冠军^②。

如果说包括国王和臣民在内的马其顿人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到公元前3世纪中期的一个世纪里在奥运会上捷报频传的话,那么在接下来的五百年中他们的奥运获胜记录几乎为零。莫雷蒂辑录的奥运冠军名录在年代上截止于公元241年第255届奥运会。从上面提到的蓓丽丝提凯获胜到这个时候为止,马其顿人可以说只有一次可能的奥运胜利记录。阿非利加努斯(Sextus Iulius Africanus)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胜利者名录》(Olympiadon anagraphe)是莫雷蒂重构奥运胜利者名单时所依据的最重要的古代史料之一。在第200届奥运会(公元21年)的题头之下,阿非利加努斯仅写了这么一句内容干瘪的话:Πολέμων Πετραῖος στάδιον,“佩特拉人波莱蒙获一斯塔狄翁赛跑胜利”。莫雷蒂赞同以前的研究者佛斯特(Förster)的意见,将这个佩特拉(Petra)断定为马其顿的佩特拉,而非其他地方的同名城市 [17] (P154 no. 751)^③。可此时的马其顿早已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

不过,就奥运会夺冠一事来讲,不在多少,只要有一次记载就可以证实这个人群参加了。而参加但未获胜的情况自然不会有记录,即或获胜而未被记录下来的也不能说在少数,否则不会有不少届只有一个或两个项目冠军的记录。另外,胜利多少恐怕是多种可以或不可以推知的因素影响的结果。奥林匹亚就在埃利斯(Elis)境内,埃利斯人的获胜次数(或者说人数)稳居第一(110多人)恐怕与其占有地利最有关系。邻近的阿卡狄亚人、拉哥尼亚人等伯罗奔尼撒族群获胜次数也很多,当中想必也少不了地理因素。但中希腊的雅典的获胜次数要远远多于伯罗奔尼撒的科林斯,这

① Idem Pythias et Olympiacas palmas quadrigis adeptus, Graeco potius animo quam regali gloriam illam prae se tulit (Solinus, 9.16).

② 蓓丽丝提凯的名字在古典文献里还有Belestikhe, Bilistikhe等多种拼法。关于她的族属和籍贯也有不同说法。《奥克叙伦科斯纸草第2082号》(P. Oxy, 2082)和鲍萨尼亚斯(Pausanias, 5.8.11)都说她是马其顿人。后者说她来自马其顿沿海地区,前者说她是“爱姐妹者”托勒密二世(Ptolemaios II Philadelphos)的情妇。雅典奈阿斯(Athenaios, 13.37, 70)也说她是托勒密二世的众多情妇之一,并说她是阿尔戈斯的一位名妓,而且是阿特柔斯家族的后人(阿特柔斯即著名的特洛伊战争的统帅阿伽门农及其兄弟墨涅拉奥斯的父亲)。据普鲁塔克(Ploutarkhos, Erotikos 753E)所说,她是一个被卖为妓的蛮族妇女,亚历山大里亚人给她修建有圣所和神庙,国王出于对她的爱而在上面刻写了铭文“阿芙罗蒂忒·蓓丽丝提凯的”(Ἀφροδίτης Βελιστιχίης)。她在亚历山大里亚与爱神爱罗斯(Eros)共享同一神庙和祭祀,在德尔菲她的镀金雕像与诸王和王后的雕像树立在一起。参见 Luigi Moretti, Olympionikai. I vincitori negli antichi agoni olimpici, p. 136 no. 549, p. 137 no. 552.

③ 另参见 Luigi Moretti, Olympionikai. I vincitori negli antichi agoni olimpici, p. 121 no. 423.

恐怕就不只是地缘问题了。中希腊的马利斯人才有一次获胜记录(公元前356年第106届),史料对此次胜利的记载还存在争议[17](P122 no. 430)。而亚历山大亲手奠基的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却有着30多次的夺冠殊荣。由此来看,政治、文化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或许也是应当考虑的因素。但古代地中海最后最大的赢家罗马也只有5人奥运共获奖11次的记录(其中2人计3次可疑),获奖者几乎都是身居高位之人,包括当皇帝之前的提比略(可疑)、其养子日尔曼尼库斯·恺撒、皇帝尼禄和曾担任过法官、执政官及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的L.米尼奇优斯·那塔利斯[17](P153 no. 738, no. 743, no. 745, P154 no. 750, P158 nos. 790-795, P163 no. 846)。罗马奥运战绩如此之少,无疑否定了奥运获胜次数与实力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假设,这或许也暗示了强者无意再用橄榄冠来为自己的头上增添光荣。

不管怎样,依靠加起来条目虽不少但内容大都干瘪的各种奥林匹克胜利者名录,来分析马其顿人奥运获奖次数不多的原因,也许是不可能的;这种分析对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其实也无必要。在用于观察马其顿人族群身份这一点上,他们在公元前3世纪中期以后奥运获胜记录的缺乏,实质上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更有助于看清问题的做法是,把他们放在奥运参赛者籍贯分布的地理维度中观察。公元前3世纪的几例获胜记录使我们能够意识到,奥运会参赛资格在地理上得到了相当大的扩展,赛会上出现了来自希腊化王国境内新建殖民城市和希腊化的当地城市的运动员。据鲍萨尼亚斯(5.8.11)所言,吕基亚人特莱波莱摩斯(Tlepolemos Lykios)获公元前256年第131届赛驹(poloskeles)冠军。而阿非利加努斯记载的本届该项目的胜利者是忒撒利亚人希波克拉忒斯(Hippokrates Thesalos)。当然,他们有一点说得一样,即赛驹项目是在这届奥运会上设立的。对于两人相互抵牾的说法,墨雷蒂选取了阿非利加努斯之说[17](P138 no. 558)。

纵然该届胜利者有疑,其他次获胜记载已足以说明问题。来自亚历山大里亚的运动员在第121届(公元前296年)、第127届(公元前270年)、第131届(公元前256年)、第135届(公元前240年)、第138届(公元前228年)和第141届(公元前216年)奥运会上获得胜利[17](P133 no. 512, P136 no. 539, P137 no. 555, P139 no. 569, P140 no. 575, P141 no. 586)。与作为托勒密埃及首都的亚历山大里亚的光荣相比,帕伽马在这一个世纪里只有一次可疑的奥运获胜记录(公元前276年第126届)[17](P135 no. 538)。特拉雷斯(Tralleis)和巴尔居利亚(Bargylia)原来都是卡里亚城市,不过自古典时代以来就已希腊化了。尼比斯(Nibis)是埃及的城市。在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下,其人口当中显然存在希腊因素,虽然也许无法精确识别此时埃及的希腊人是希腊移民的后裔,还是希腊化的埃及人,还是混血,还是在希腊人和埃及人之间可以随时转换身份的“双面人”。这三个由“蛮族”居地变身而来的希腊化城市,分别第121届(公元前296年)、第137届(公元前

232年)和第141届(公元前216年)奥运会后迎来了自己的胜利者回归[17](P134 no. 519, P139 no. 572, P140 no. 581)。

而在公元前3世纪之后,培育出奥运冠军的前“蛮族”国度就更多了,除了上述的吕基亚、卡里亚和埃及外,还包括比提尼亚、基利基亚、吕底亚、腓尼基、弗吕吉亚、叙利亚等地。胜利者的身份既是这些地区某个城市的本乡人,又是“希腊人”。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语境当中,来自希腊化新世界的运动员祖上可能的蛮族背景,无论是血统上的还是地理上的,想必都已被奥林匹亚的“希腊裁判”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他们自己及其操希腊语的同乡很可能也会对此有意或无意地选择隐瞒或遗忘。这种参赛资格的扩展正是从马其顿人那里开始的,继而他们又是在这种新潮流中一再参赛的。

马其顿人作为一个族群最先能够在国际场合被接纳为希腊人,是与希腊化时代文化-族群关系的变动和他们独特的族群地位分不开的。在亚历山大及其以后的时代,马其顿帝国主义在希腊人眼中构不成腓力二世时代的那种威胁了。腓力的马其顿是令当时希腊世界猝不及防的谋求传统霸权(hegemonia)的一匹黑马;而后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们以征服和建立殖民城市相结合的新的帝国主义形式,为从地中海到中亚的广阔地带安排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古典时代的城邦制度非但没有被破坏,反而在更大得多的地理范围内由新建的殖民地所复制。东方原住民和希腊移民被整合进入一个更大的族群-文化既彼此互动又相对独立的社会系统之中。无论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都很快接受并适应了亚历山大制造的新现状。尤其是在移民环境中,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自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时代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在继续,两个族群之间因长期拥有的相同文化和当下的共同利益而在文化表征和族群心态上往往难分彼此。阿提卡方言以及由它发展来的希腊“共同语”(koine)早已成了马其顿人最常说、最常写的语言,而后又成了希腊化新世界的共同语(lingua franca)。古典时代马其顿国王们大力推广的希腊文化又成了希腊化各王国统治者持有的最重要的官方文化,因而也成了最具吸引力的世界性文化。在东方当地,掌握希腊语和接受希腊生活方式成为非希腊人在社会上谋求更多上升机会的有利途径,文化层面的希腊化至少在精英阶层当中或多或少地发生了,甚至某些希腊化的当地人也在心态上与前来的希腊移民合流了。移民经过几代延续很有可能会忘记他最初的祖籍,他们移入的东方某地则变成了他们依恋的祖国,而这里同时又是那些变身为希腊人的原住民世代居住的家园。在这种族群重组的新形势下,从地理范围上扩展奥运参赛资格成为一种必然。

扩展自然是从马其顿人身上开始的。他们是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父子所属的族群,势必要沾他们国王的光。马其顿国王如同今天拥有双重国籍的人一样,具有双重族群身份。他们是马其顿人,又被公认为

拥有希腊血统,能够参加奥运会,而且腓力和亚历山大均被选举为希腊人的“领袖”(hegemon)。以国王为纽带,将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轻松捆绑成一束新的民族之花,无疑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等到非王室来源的马其顿人在奥林匹亚通过“希腊裁判”的参赛资格审核那一刹那,马其顿和希腊两种族群身份之间的关系格局就在观念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以前是希腊人对马其顿人偶尔欲迎终究还拒,两者大体上是对等族群;现在马其顿人被视为和自视为希腊人的一个次一级的族群(ethnos),像忒撒利亚人、彼奥提亚人和埃托利亚人那样的次族群。

二、“同文同种”式的话语

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一个次族群的观念,不仅流行于奥运赛场,也清晰地表白于希腊大陆本土城邦世界的外交磋商之中。在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运动员前来赢得第141届奥运会胜利的时刻,新兴的罗马帝国主义正在成为威胁希腊大陆的一片“来自西方的阴云”。在共同的敌人到场的语境下,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马其顿人,都说出了具有同类修辞的认同话语。

公元前211年,阿卡尔那尼亚人的使节吕基斯括斯(Lykiskos)在斯巴达曾发表长篇演说,反驳埃托利亚同盟使者克莱奈阿斯(Khlaineas)向斯巴达人提出的、与埃托利亚同盟和罗马一起作战的建议,劝说斯巴达人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和阿凯亚同盟结盟。在波利比奥斯笔下的演说词文本中,有这样一席话:

因此我要问问你们,克莱奥尼括斯(Kleoni-kos)和克莱奈阿斯,你们那时邀请他们(斯巴达人)与你们合作,你们有些什么样的同盟者?你们的同盟者难道不是全体希腊人吗?你们现在又在和谁共寄希望,或者你们邀请他们缔结一个什么样的同盟啊?这不是与蛮族人(指罗马人)的同盟吗?你们无论如何都以为现在和那时的情况相同而非相反。因为那时你们与同族人(ὁμοφύλους)阿凯亚人和马其顿人为了霸权和荣誉而斗争,而现在一场事关奴役的对外族人(ἄλλοφύλους ἀνθρώπους,指罗马人)的战争正在迫近希腊人,你们想拉上外族人反对腓力,可你们没有意识到这是在拉着外族人反对你们自己和整个希腊[18](9.37.4-9)。

即便这些演说词并非对现场发言的实录,而是波利比奥斯推想的当时应有的表述,但在此后十年左右出生的波利比奥斯在想象这些话语的时候也不可能违背当代的形势和当代人的意识,更何况他是一位富有判断力的历史学家。让一个阿卡尔那尼亚人把阿凯亚人和马其顿人说成是埃托利亚人的“同族人”,将罗马人暗指为“蛮族人”和“外族人”,让整段话充满着泛希腊主义论调。这种话语策略当中包含着这样一种观

念:马其顿人和阿卡尔那尼亚人、埃托利亚人、阿凯亚人一样,都是希腊人当中的次群体。而且,ὁμοφύλοι和ἄλλοφύλοι这两个词表达的都是血缘内涵,这暗示着希腊人被认为是拥有着共同血缘的群体。

在李维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一段类似的演说。公元前200年,在埃托利亚同盟会议上,腓力五世派遣的使节劝说埃托利亚人不要背弃与马其顿之前签订的和约而倒向罗马。其中一个使节这样说道:

如果更多的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lingua et moribus et legibus)而非海洋和陆地空间上与我们分开的外族人(alienigenae homines)控制了这些话,还指望任何事情都会保持现状,那就是疯了……埃托利亚人、阿卡尔那尼亚人、马其顿人是说同种语言的人(eiusdem linguae homines),他们有时会因发生的一些小事而分分合合;与外族人(alienigenis),与蛮族人(barbaris),全体希腊人则有着并将有着一场永久的战争,因为在永恒的本性上,而不是出于某些日常可变的原因,外族人就是敌人[19](31.29.12-15)。

李维关于罗马与希腊化国家关系的史料来自波利比奥斯[20](PII, 2)。从风格、用词和论调来看,这段演说与上段演说十分相似,如果不是李维袭用那便是借鉴波利比奥斯第16卷记载同样史事的某处已佚之笔。alienigenae这个词也表述了一种血缘内涵,很可能是从希腊语ἄλλοφύλοι译来。不过这段话中没有出现从血缘方面表达“同族人”概念的名词,希腊人和外族人之间的区别被说成是在语言、习俗和法律方面,马其顿人与埃托利亚人和阿卡尔那尼亚人的同一关系也仅被表述为语言相同。

当时在外交场合认定马其顿人属于希腊人应该是一种普遍话语。在腓力五世及其希腊盟国与汉尼拔的结盟条约中出现了这样的程式化短语:“马其顿和希腊的其他地方”^①、“马其顿人和其他希腊人”^②。既然条约是所有缔约人意见一致的产物,那么它所表述的马其顿人属于希腊人的观念也应该是马其顿人、希腊人乃至外族人共有的观念。如果说罗马帝国主义不是导致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的话,它应该也是强化这种观念的力量。在新来的敌人面前,语言的同一性很容易被发现和理解彼此团结的绝好理由,保障政治团结的最佳办法也莫过于强调同族关系。公元前217年,埃托利亚同盟与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及其同盟者在瑙帕克托斯(Naupaktos)举行和谈,会上埃托利亚人阿盖劳斯(Agelaos)敦促双方尤其是腓力停战,他说道:“希腊人真应该彼此永远不要战争,而如果他们全体能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像涉水过河时那样手挽着手,击退蛮族人的进犯,共同保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城邦,他们就

① Μακεδονίαν καὶ ἄλλην Ἑλλάδα (Polybios, 7.9.3). 比较 Strabon, 7.7.1.

Μακεδόνων καὶ ... τῶν ἄλλων Ἑλλήνων (Polybios, 7.9.5); Μακεδόνες καὶ τῶν ἄλλων Ἑλλήνων (Polybios 7.9.7). 比较 Strabon,

② 10.2.23: τοὺς Μακεδόνας καὶ τοὺς ἄλλους Ἕλληνας.

应该重谢诸神了。”[18](5.104.1)这句强调民族团结的修辞当中也包含着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潜台词。

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本人就是罗马帝国主义扩张和战胜希腊的见证人。其著作的文本本身就是关于希腊化时代族群认同话语的绝好的一手资料。例如,第38卷导言的第一句话说这卷内容“包括希腊人的不幸(ἀτυχίας)的结局”[18](38.1.1)。在后面他又列举了“该时期同时遭遇不幸(ἡτύχησαν)”的各希腊族群名称:伯罗奔尼撒人、彼奥提亚人、佛基斯人、……人、洛克里斯人、伊欧尼亚湾的某些居民,“他们之后还有马其顿人”[18](38.3.8)。在波利比奥斯眼中,马其顿人也是希腊人内部多个族群中的一个。

三、“我是希腊人”,托勒密埃及的马其顿人如是说

我们在托勒密埃及也发现了马其顿人被认为和自认为希腊人的证据,但这里这种认同的情境与在马其顿本土和希腊不同。埃及是享受和平而未受罗马威胁时间最长的希腊化国度,在这里马其顿人被视为希腊人的动力来自内部。托勒密当局在行政、税收和司法管理上一般只区分希腊人与埃及人,两者的区分大致(虽不完全)等于外来移民和土著的区别。外来移民虽有多种族群,但大都说希腊语,马其顿人也包括在其中。而且,甚至马其顿人的群体也不是封闭的。像其他非希腊族群的移民一样,埃及人可以通过军队服役获得官方认定的马其顿人和希腊人身份。在军事殖民者(katoikoi)的名单中偶尔会发现埃及名字,但是频繁置身于希腊方式的人际环境中时,他们更倾向于采用希腊名字。在泰布图尼斯(Tebtunis)出土的10篇纸草上的记录就讲述了一个希腊名字叫“马隆”(Maron)的土著埃及人如何变为马其顿人的故事:马隆最初只是普通的警察,但在长期服役之后,他被擢升为骑兵军事殖民者,领受了100阿鲁拉(arourai)授地,并获得了统治者的族群身份。年代最晚的纸草将他描述为“骑兵军事殖民者中的一个马其顿人”(Μακεδών τῶν κατοίκων ἱππέων)。而早晚不同的纸草对他和他父亲名字的叫法,也反映了他们由仅用埃及名字,到采用双名,最后到仅用希腊名字的变化过程^①。

我们从纸草上还听到一个马其顿人几次三番地大声疾呼自己是希腊人的故事。此人叫托勒密(Ptolemaios),长期隐居于孟菲斯的塞拉皮斯神庙(Serapieion)中。他曾几次遭受居住在旁边阿努比斯神庙(Anoubie-

ion)里的多名埃及人的袭击。为此,他给当局写了一系列的控诉信^②。在每封信开头——按当时的书信格式,收信人和写信人的名字均出现在这里——都称自己为“格劳基亚斯(Glaukias)之子托勒密,马其顿人”(Πτολεμαῖος Γλαυκίου Μακεδών),而在解释遭遇埃及邻居进攻的原因时他又三度表白:“因为我是希腊人。”^③

从在孟菲斯出土的其他一些纸草来看,托勒密还有三个弟弟[21](9.6-7),其中的一个弟弟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曾跟他在塞拉皮斯神庙里一起隐居[21](14.9-11),而且也同样遭受过埃及人的袭击^④。根据托勒密的讲述,他们的父亲生前是“在海拉克莱奥波利斯(Herakleopolites)州的同族殖民兵(συνγενῶν κατοίκων)的一员”,在公元前2世纪60年代中期的骚乱中丧生[21](14.7-9)。在写给国王和王后的信中使用συνγενές(“同族”)一词不仅表明了其族属为马其顿人,而且也暗示了马其顿人作为统治族群的特殊地位和荣誉。κάτοικοι的一般意义为“居民”,在希腊化时代它通常用于指军事殖民者,这些人构成希腊-马其顿移民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公元前158年,经其兄向国王申请后,阿波罗尼奥斯被批准入伍,在驻孟菲斯的一支部队中服役。托勒密为其弟请求当兵的理由是,自己没有孩子,弟弟当兵可以使自己在神庙隐居时“保持体面和获得帮助”。但参军后不久,阿波罗尼奥斯就被派往外地履行公务。接着托勒密就在公元前156年又一次遭到袭击。于是他又给国王写信请求免除阿波罗尼奥斯的公务,以便让他能在自己身边。他认为袭击者正是看准了他弟弟在外履行公务之机,向他发动袭击的^⑤。

在两兄弟遗留下来的纸草中,有一些是他们摘抄的文学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摘抄文本的内容主要是关于亚历山大里亚的宏伟建筑和希腊人客居异国他乡的。例如,阿波罗尼奥斯努力用最漂亮的书法抄录了欧里庇得斯的《泰莱佛斯》(Telephos)开场白的一部分。在这部分中,泰莱佛斯自述他远离故乡阿卡狄亚来到密西亚统治密西人,慨叹到他“一个希腊人用很多武装费力地统治蛮族人,直到阿凯亚军队到来开向密西亚平原时为止”。抄到这里,阿波罗尼奥斯的笔迹变坏了,他也突然不再继续往下抄了。紧接着他自己加上了这样一句:“马其顿人阿波罗尼奥斯……一个

① 这10篇纸草及其提及马隆父子名字处,按年代顺序排列如下:P. Tebt. I 62. 110; P. Tebt. I 84. 105-106, 114-115; P. Tebt. I 161a. 40; P. Tebt. I 64a. 107-108; P. Tebt. I 63r. 127; P. Tebt. I 245; P. Tebt. I 85. 59; P. Tebt. I 75. 10; P. Tebt. I 105. 2, 12; P. Tebt. I 106. 1, 6-7.

② 这些控诉信的纸草编号及其提供的历次袭击时间如下:UPZ I 5; 6(公元前163年10月18-19日);UPZ I 7(公元前163年11月12日);UPZ I 8(公元前161年11月8日);UPZ I 15. 25-32; 16. 12-21(公元前156年5月8日不久前)。其中UPZ I是Ulrich Wicken ed., Urkunden der Ptolemäerzeit (Ältere Funde), 1. Bd.: Papyri aus Unterägypten, Berlin und Leipzig: Verlag vo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27的国际学界通用缩写形式。此处对纸草中埃及历法日期的公历换算是采用http://aegyptologie.online-researchen.de/Ptolemaic_Kings所提供的换算系统计算得出的。下同。

③ παρὰ τὸ Ἑλληνὰ με εἶναι (UPZ I 7.21-22); παρὰ τὸ Ἑλλήνα εἶναι (UPZ I 8.14); ἔνεκα [τοῦ] Ἑλληνά με [εἶν]αι (UPZ I 15.16-17).

④ 记载遇袭的纸草和遇袭时间为UPZ I 12(公元前158年7月23日);UPZ I 13(公元前158年)。

⑤ 纸草文献中保存了关于托勒密兄弟的庙中修行、生平经历和社交网络的诸多细节。见UPZ I 14; 15; 16。

马其顿人,我说。”^①兄弟两人抄录希腊经典的行为和抄录内容的选择,都表明了他们在异族占多数的社会中有着某种表达认同的心理需要。就抄写《泰莱佛斯》这一篇而言,阿波罗尼奥斯似乎是抄到伤心处没心思再抄下去而停笔的,他加上的自白文字之间也仿佛流露了一种怅然。从这种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剧文对他心境的影响之大。在对剧文的回应中,他表达了作为统治族群的一员而客居异邦的心境。

有趣的是,兄弟两人还留下了一些梦的记录。这些梦被记载在三篇希腊语纸草、一篇世俗体埃及语纸草和一片用埃及语写的陶片上。做梦者绝大多数都是托勒密,但梦中人物有兄弟两人。兄弟两人还收养了一对落难的埃及孪生姐妹,有一次做梦者是这对孪生姐妹中的一个。在阿波罗尼奥斯做的一个梦里,梦见他听到某人对一个男人说:“喊出这句吧‘阿波罗尼奥斯,你是一个希腊人……是个埃及人。’”[21](P77-80)[22](P81-84, 168 n. 10)[23](P314)梦里的这个男人也被人叫做“阿波罗尼奥斯”,看起来就像是阿波罗尼奥斯自己。像在现实中一样,在梦中他仿佛也正置身于一种族群相遇的环境之中,虽然是别人告诉他还有埃及人的存在。而且,在这样被告知与埃及人相遇的梦境中,那个跟他说话的人似乎是在提醒他别忘了自己的希腊人身份。可以想到,这其实是阿波罗尼奥斯在潜意识里的自我提醒。

两兄弟留下的这些活生生的文字,让我们一瞥生活在希腊化埃及的普通马其顿人自我认同为希腊人的鲜活事实。他们直截了当地宣称自己是希腊人,日夜想不忘自己的希腊人身份。

四、他称与外族视角

如果说埃及人及其本土文化传统与托勒密王朝的马其顿-希腊统治阶级和移民之间能够实现一种彼此适应的话,塞琉古王国的犹太人与王国官方之间的关系却最终恶化了。尽管恶化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的确是国王安条克四世的强制希腊化政策直接导致了犹太·马卡比领导的犹太人起义。记载这场起义的两篇《马卡比书》虽然是站在反塞琉古和反希腊化立场上写的,采用的纪年却是从塞琉古一世重新控制巴比伦之年,即公元前312年算起,这一年也通常被人们认定为塞琉古王国的起始之年^②。《马卡比一书》1.11披露了这种纪年的全称应该是“希腊人王国的第n年”^③。“希腊人王国”这一称呼意味着犹太人是将马其顿人归入希腊人范畴之内的。

对马其顿人类似的族群归类也见于其他东方民

族。埃及人用以称呼希腊人的族称 Wynn 所指也包括马其顿人。印度文献也不区分马其顿人与希腊人,他们都被称为 Yavana、Yona 或 Yonaka。其实在古风时代就有过这种归类。一则年代为公元前513年的铭文记载了那时臣服于波斯大王的欧洲民族。其中一个民族被称作 Yaunā takabarā,意即“戴盾牌形帽子的希腊人”^④。东方各语言中的 Wynn、Yaunā、Yavana、Yona、Yonaka 等均来自伊奥尼亚人的希腊语族称 *IāFovec 或其更新的演变形式 *Iovec,但这些他称在所指上却不同于作为其词源的自称:希腊人所说的 *Iovec 仅仅是作为其一支的伊奥尼亚人的族称,由它而来的各种他称却被东方各民族用来指称全体希腊人。所谓“盾牌形帽子”指的应是马其顿人戴的一种特殊的帽子 kausia,这种帽子希腊人不戴。它在马其顿的钱币上经常可以看到,其形状就像盾牌[24](P4-7)[25](P13)[26](P49, P535 n. 55),所以波斯人所言“戴盾牌形帽子的希腊人”应该就是在指马其顿人。另一则年代在公元前479/8年的波斯铭文印证了这种认识。这则铭文也列出了臣服于波斯大王的欧洲民族,却未提到“戴盾牌形帽子的希腊人”。此时恰逢马其顿人与波斯人作战[26](P49)。由此可见上述族称所指的确是马其顿人。事实上,希腊人也被波斯人按地理划分为“大陆希腊人”“沿海希腊人”“跨海希腊人”等不同的群体,而“戴盾牌形帽子的希腊人”显然是与上述描述处于同一语义层面上[27](P323-346)。这更说明这一族称意味着波斯人认为马其顿人是希腊人的一部分。

希腊化时代东方各民族将马其顿人视为希腊人成员的看法显然是他们更早时代以来的族群划分传统的延续。这种外部的观念以前并未对希腊人的认同产生过什么影响,但在希腊人和非希腊人、希腊文化和非希腊文化互动非常频繁的希腊化世界,它的族群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它为马其顿人自认为和被希腊人认为是希腊人提供了一种外部的族群参照环境。

五、结论

到了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已经不再置身于公元前4世纪中期那种在“希腊人-蛮族人”两极对立观念笼罩下的族群身份争议的漩涡之中了。马其顿帝国主义对希腊世界不再构成一种足以引发焦虑的威胁,相反它带来了一个更广阔的具有某种“全球性”特征的希腊化世界。在东方的希腊化王国当中,无论是希腊人还是马其顿人,都是新移民,而且是持有相同文化和语言的新移民。当地人口的社会上层也在文化表征上或

① 该纸草此处编号为 P. Med. 1. 14-16。关于纸草手书笔迹的情况,见 Dorothy J. Thompson, “Hellenistic Hellenes: The Case of Ptolemaic Egypt”, in Irad Malkin (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p. 314.

② 例如 Makkabaion A 1. 11, 20, 54; 2. 70; Makkabaion B 11. 21; 13. 1.

③ 例如 ἐν ἔτει ἑκατοστῷ καὶ τριακοστῷ καὶ ἐβδόμῳ βασιλείας Ἑλλήνων, “希腊人王国的第137年”,即公元前175年(Makkabaion A 1. 11)。

④ Katpatuka; Sparda; Yauna; Sakā; tyaiy; paradaraya; Skudra; Yaunā; takabarā; Putāyā (Darius, Nakš-i Rostama 28-9), 转引自 Roland G. Kent, “Old Persian Texts: IV. The Lists of Provinces”,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2 (1943), pp. 302-306; Jack Martin Balcer, “Persian Occupied Thrace (Skudra)”, *Historia* 37 (1988), pp. 1-21.

多或少地发生了希腊化,而且也不排除某些人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产生某种希腊身份认同。持有希腊文化的新移民和希腊化的当地上层共同构成社会的精英阶层,日益难分彼此,最后变得也无过细区分的必要。就是在这种变化了的族群大环境当中,奥林匹克运动会接纳了非王室血统的马其顿参赛者以及其他来自东方希腊化世界的运动员。这标志着希腊人的族群范围在扩大,而判定新增希腊人身份的最直观的外在标准在于对希腊文化的持有。这样,马其顿人就由原来经常被希腊人认为且自认为与希腊人不同的一个族群(ethnos)变成了希腊人内部的一个次一级的族群(ethnos)。尤其是在西方罗马帝国主义的威胁面前,马其顿王国和希腊本土的一些希腊人更加由衷地感受到了抱团取暖的必要,同语同族的话语一再出现于外交场合。

对于发生在马其顿人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新变化,不妨可以做这样一系列类比:以前的马其顿人就如同色雷斯人、伊利里亚人或波斯人那样的蛮族族群(ethnos),现在的马其顿人则像彼奥提亚人或佛基斯人这样的希腊人的族群(ethnos)。现在不仅马其顿人自认为是希腊人,而且希腊人也这样看,外族人同样这样

看。而在此前他们自己和希腊人都不这样看,虽然外族人把他们算成是希腊人。到了此时,他们与其他希腊人的族群一起结成一个更大的希腊族群(ethnos),而这个希腊族群处于与波斯人那种族群(ethnos)平列的地位(也就是说,希腊族群和波斯族群再不能结合成一个更大的族群了)。希腊人身份构成了马其顿人、埃托利亚人、阿卡尔那尼亚人、阿凯亚人、彼奥提亚人、佛基斯人、雅典人、斯巴达人等等诸多族群(ethne)和城邦(poleis)共享认同的天花板。

不过,马其顿认同并没有完全被希腊认同所遮蔽。在相关史料较多的托勒密埃及,我们可以看到,马其顿人能够拥有国王的“同族人”身份,这是一种被置于希腊集体身份当中的更值得自豪的特殊荣誉身份。本土的埃及人也不缺少获得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身份的社会机会。

由此可见,希腊化时代马其顿人的身份认同虽然不像之前那样构成族群政治话语争论中大起大落的焦点,但也不是死水一潭似地固着不动,它依然处于动态建构之中,若涟漪涌起,则波光粼粼。

参 考 文 献

- [1] Pseudo-Hesiodos. Katalogoi gynaikon (M. - W.) [A].
- [2] Hellanikos. FGrH 4 [A].
- [3] Herodotos. Historiai [A].
- [4] Pseudo-Apollodoros. Bibliothek [A].
- [5] Aelianus. Peri zoion idiotetos [A].
- [6] Strabon. Geographika [A].
- [7] Thrasymakhos Khalkedonios. (DK) [A].
- [8] Demosthenes. Logoi [A].
- [9] Aiskhines. Logoi [A].
- [10] Diodoros Sikeliotes. Historike bibliothek [A].
- [11] Pseudo-Skymnos. Periegesis [A].
- [12] Thukydides. Historiai [A].
- [13] Theopompos. FGrH 115 [A].
- [14] Iustinus. Epitoma Historiarum Philippicarum Pompei Trogi [A].
- [15] Isokrates. Philippoi [A].
- [16] Ploutarkhos. Alexandros [A].
- [17] Luigi Moretti. Olympionikai. I vincitori negli antichi agoni olimpici [A]. Roma: Signorelli, 1957.
- [18] Polybios. Historiai [A].
- [19] Livius. Ab urbe condita libri [A].
- [20] Donald Walter Baronowski. "Livy, Book 45: Historical Commentary and Study of Sources" [M]. MA thesis. McGill University, 1972.
- [21] Ulrich Wicken (ed.). Urkunden der Ptolemäerzeit (Ältere Funde), 1. Bd.: Papyri aus Unterägypten [A]. Berlin und Leipzig: Verlag vo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27.
- [22] Naphtali Lewis. Greeks in Ptolemaic Egypt: Case Studies in the Social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 [23] Dorothy J. Thompson. "Hellenistic Hellenes: The Case of Ptolemaic Egypt" [C]. in Irad Malkin (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4] Jack Martin Balcer. "Persian Occupied Thrace (Skudra)" [J]. Historia 37 (1988).
- [25] N. G. L. Hammond. The Macedonian State: Origins, Institutions, and History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
- [26] M. B. Sakellariou (ed.). Macedonia: 4000 Years of Greek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M]. Athens: Ekdotike Athenon S. A., 1974.
- [27] Helen Sanctis - Weerdenburg. "Yavna by the Sea and across the Sea" [C]. in Irad Malkin ed., Ancient Perceptions of Greek Ethnici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责任编辑 陈朝云)